

王夫之《易》史互證中的經世思想

林書漢*

（收稿日期：109 年 3 月 30 日；接受刊登日期：109 年 6 月 30 日）

提要

身處明末清初之際的王夫之，治學融治經史，其易學與史學相互闡發，反映出為國為民的憂患意識與經世思想，以及論學著重於因應現實事理變化的特性。

王夫之主張史須著經世之大略，他的經世思想乃指經世致用之道，此鮮明的表現在他史論當中。究竟他是如何結合《易》道於史論中體現，為本文的關注重點所在。本文的研究取徑，首先從「位」與「時」的角度切入剖析，以「位」論政統與天下之大貞，以「時」論治道的運用。其次，從「貞」的角度論述士道實踐，分析士人的進退選擇、守道與吉凶的關係，思索船山對士人的抱負期許。相信透過《易》史互證的方式，能對歷史的變化發展與得失成敗之因有更清楚的認識，並深化王夫之經世思想的內涵，體現其價值意義。

關鍵詞：王夫之、船山、經世、易史互證、貞勝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兼任講師。本文蒙兩位匿名審查委員惠賜修訂意見，謹致謝忱。

一、前言－王夫之《易》史互證的基礎

援史證《易》是古人常見的治學方法，宋朝時逐漸興起，至清朝時蔚為大盛，形式內容豐富多樣，頗具特色富有討論價值。¹由於明末清初的學者普遍融治經史，²兼顧經書義理與人事制度的實用層面，因此，《易》理的印證與如何活用借鑑成為當時學者所關注的重點之一，此亦鮮明地表現在王夫之（1619—1692）³的《易》學思想。《周易內傳》書末的〈周易內傳發例〉⁴揭示船山論《易》的基本原則與理念，整理摘錄幾個與本文有關的重點如下：

唯《易》不可為典要，故玩〈象〉、〈爻〉之辭者，亦不可執一以求之。⁵

當位之吉，不當位之凶，其恆也。……故有不當位而吉，當位而不吉，應而不利，不應而利者。以人事徵之。⁶

君子之謀於《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憂、知懼，而知所擇執也。⁷

大略以〈乾〉〈坤〉並建為宗，錯綜合一為象；〈象〉〈爻〉一致、四聖一揆為釋；占學一理、得失吉凶一道為義。⁸

第一，船山解《易》有不同的策略方法，有「即爻之得失而象占在者」，也有「爻中之象占，有爻外之象占」，必須搭配其他爻方能圓滿其義，因此特戒世人不可執一句一爻之義

¹ 黃忠天：「夫援史證《易》本為易家釋《易》普遍之現象，然自趙宋三李一楊（李光、李杞、李中正、楊萬里）開宗奠基後，歷宋元明三朝而代不乏人，至有清一朝，更以超邁往古之姿，創猗歟盛哉之勢，將史事易學推至極盛。由於此派易學著作甚多，易家援引史事形貌多樣，不僅豐富史事易學之內容，亦充實《周易》義理一派之易學內涵，並建構出此派易學獨特之體系，值得吾人深入研究。」黃忠天：〈史事宗易學研究方法析論〉，《周易研究》2007年第5期（2007年10月），頁40。

² 何佑森：「到了清初，經過一次動亂，讀書人的觀念改變了，他們開始覺得，經和史不可分，也不能分。這時，出現了很多兼通經史的大儒，他們研究的是『經史之學』；當時人稱之為『通儒之學』。」何佑森：〈明末清初的實學〉，收入何佑森：《清代學術思潮——何佑森先生論文集【下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年4月），頁80。

³ 王夫之，字而農，號薑齋，自署船山病叟、南嶽遺民，晚年隱居於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本文以下簡稱為船山。

⁴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頁649-684。

⁵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69。

⁶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72。

⁷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71。

⁸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83。

而概論全部；第二，從當位與否判斷吉凶是《易》的常例原則，然而人事變化多端因此會有變例的產生，故「位無恆，應必視其可應，以為趣時之妙用」，要隨時觀察目前的情勢做出應對調整；第三，君子學《易》用《易》的目的在於養成憂患意識，防患於未然。最重要的能知所擇取，當遇到事情時能有正確的進退之道；第四，「大略以〈乾〉〈坤〉並建為宗」沿襲《周易外傳》一貫之旨。⁹船山認為〈乾〉〈坤〉二卦是《周易》六十四卦的基礎，蘊含六十四卦的變化，這是他《易》學的核心宗旨。他認為《易》經伏羲、周文王、周武王、孔子演繹傳承，《易》道本身並無不同，因此言彖爻一致、¹⁰四聖一揆。¹¹見〈周易內傳發例〉言：

若夫《易》之為道，即象以見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學，切民用，合天性，統四聖人於一貫，會以言、以動、以占、以制器於一原，則不揣愚昧，竊所有事者也。

船山標舉出即象見理，從理之得失論占之吉凶的方法途徑，並統措言、動、占、制器，揭示《易》之學理與致用彼此緊密的聯繫關係。會於一、一以貫之，呈現船山由簡馭繁的思維模式，此「一」非是渾合，而是《易》道之本的統攝融貫。

船山論《易》靈活彈性不執著於一義，著眼於現實人事的變化考量，¹²是以，史事恰恰成為一個絕好的借鑑發揮之處。從船山史論中出現大量引《易》論史的情形，即說明著他是有意識地透過《易》史互證的方式來闡明其經世思想。¹³接下來，筆者將從船山對歷史的觀點梳理切入思考，他說：

⁹ 明·王夫之：《周易外傳》：「大哉《周易》乎！〈乾〉〈坤〉並建，以為大始，以為永成，以統六子，以函五十六卦之變，道大而功高，德盛而與眾，故未有盛於《周易》者也。」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989。

¹⁰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六爻之得失吉凶雖雜，若不合於象，然唯其發動之時位，因時立義耳，非有悖於卦之質也。」，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08。各爻是因時立義，但並不違逆卦體本質。汪學群針對彖爻一致分析道：「總之，卦辭統帥諸爻辭，但不否認各爻有相對的獨特性，卦辭作為諸爻辭差別的整體，起著主導作用。」汪學群：《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5月），頁158。

¹¹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蓋孔子所贊之說，即以明〈象傳〉、〈象傳〉之綱領，而〈象〉、〈象〉二傳即文、周之象、爻，文、周之象、爻即伏羲之畫象，四聖同揆，後聖以達先聖之意，而未嘗有損益也。」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49。

¹²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讀《易》者所當唯變所適，以善體其履遷之道也。」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06。

¹³ 汪學群：「王夫之治《易》，喜用史實加以證明，他所引證的史實，以古代的政事為主，其引證史實有以古喻今之意。因此，引史證《易》具有濃厚的經世致用色彩，也是其經世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頁454。

所貴乎史者，述往以為來者師也。為史者，記載徒繁，而經世之大略不著，後人欲得其得失之樞機以效法之無由也，則惡用史為？¹⁴史者，垂於來今以作則者也。¹⁵

歷史的可貴在於從過去的得失成敗中獲得經驗教訓，作為後世行事參考的借鏡，其中最重要者莫過於記錄「經世之大略」，也就是經世之法。「經世」一詞在船山思想中，很明確指向經世致用之道。¹⁶其衍生出的課題，即是如何實踐經世？如何克服實踐過程中所遭遇到的種種難題挑戰？士人所須具備經世前提的條件為何？可以說，經世是一系列環環相扣的整套功夫。這些諸多問題的答案可從分析史事中得到，船山在《讀通鑑論》卷末〈敘論〉闡述他的論史目的：

曰「資治」者，非知治知亂而已也，所以為力行求治之資也。

然則治之所資者，一心而已矣。以心馭政，則凡政皆可以宜民，莫匪治之資；而善取資者，變通以成乎可久。設身於古之時勢，為己之所躬逢；研慮於古之謀為，為己之所身任。取古人宗社之安危，代為之憂患，而己之去危以即安者在矣；取古昔民情之利病，代為之斟酌，而今之興利以除害者在矣。得可資，失亦可資也；同可資，異亦可資也。故治之所資，惟在一心，而史特其鑑也。

「鑑」者，能別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視者，可就正焉。顧衣冠之整，瞻視之尊，鑑豈能為功於我哉！故論鑑者，於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於其失也，而必推其所以失。

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邊防在焉，臣誼在焉，臣節在焉，士之行己以無辱者在焉，學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雖扼窮獨處，而可以自

¹⁴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225。

¹⁵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781。

¹⁶ 船山雖然沒有明確直接對「經世」一詞做出明確的定義，但他於多處使用「經世」一詞，如闡釋《論語》「為政以德」句：「夫子乃正言治理以示人曰：人君而苟有志於為政，則必有操之於心、見之於事者，以為經世之大用，而抑將何所以哉？」明·王夫之：《四書訓義（上）》，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7冊，頁277-278。從治道層面談經世，為治理國家之義。明·王夫之：《讀通鑑論》：「古之聖人，絕地天通以立經世之大法。」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203。又明·王夫之：《讀通鑑論》：「君子之道以經世者，唯小人之不可竊者而已；即不必允協於先王之常道而可以經世，亦唯小人之所不可竊者而已。」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204。認為經世之大法創立於古代聖人，這是一套可以運用在治道與士人處世的學問，後世君子亦繼續實踐經世精神，貫徹士道價值理想。

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故曰「通」也。¹⁷

船山論史並非只是要知道史事的治亂始末，而是要能提供給治國者參考。借古鑑今，遇到類似情況時能不再重蹈前人覆轍，此為「資治」；「鑑」，如同一面鏡子，能照映出史事的得失成敗，並進一步推求背後的得失成敗之因；至於「通」，乃會通一切人事，昭示人所當為之道，使士人朝此邁進實踐內聖外王的理想。船山說：「道因時而萬殊也」，¹⁸雖然「道」在不同的時候會有各種不同面向的展現，然而其真理原則不變。¹⁹人要在世局變動中把握天道人道，因循貞常而行，以常治變，這是船山論史的宗旨，可歸結為「通變資治」四字。從此省思，欲「通」必須要有「鑑」的能力，結合二者運用以達到國家安定、君臣得治的經世理想。而「通」、「變」的精要正是須從《易》中獲得，《易》會通天道人事，與史事相互切應發明，曉喻人們在詭譎多變世局中如何通變自處。那麼進一步思考，史論中船山不時引《易》論證他的通變之道，透過《易》史相互闡釋所昭示出的經世思想為何？《易》史互證的價值又為何？乃是本文的考察重點。

經由以上的爬梳，初步規模出船山《易》史互證的方法與融通基礎。關於船山《易》史互證的討論目前學界已有一些成果。吳懷祺〈王夫之的易學與史論〉強調船山《易》學與史學是一個整體，《易》道不離器、天下惟器的道器觀，為船山史論提供了哲學基礎，並能從船山歷史盛衰論中端見《易》理。²⁰吳氏還指出，船山重人事思想與通變思想連繫在一起，是他史學思想一個十分重要的特點。此文甚是著重於船山《易》史之間的緊密互證性；汪學群《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一書，第七章〈經世致用思想〉中有一小節〈引史證《易》與經世〉，略為從《周易內傳》注釋引用史事的情形，談治國方略與君臣關係；李皇穎著眼於《周易外傳》，從治經方法與義理思想等切入，初步歸納出一些特色。根據李氏的研究，船山早年著作的《周易外傳》中便已出現大量《易》史互證的現象，他並將此連繫至明遺民鼎革之際的時代背景下俯視，指出《周易外傳》是明遺民史

¹⁷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1181-1182。

¹⁸ 明·王夫之：《周易外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112。

¹⁹ 明·王夫之：《周易外傳》：「時亟變而道皆常，變而不失其常，而後大常貞終古以協於一。」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112。

²⁰ 吳懷祺：〈王夫之的易學與史論〉，《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6期（2000年11月），頁1-7。吳懷祺於文中道：「船山的史論與易理緊密聯繫成為一個整體，沒有船山的易學，其史論也就失去了基礎，同樣沒有船山的史論，其易學也失去了光澤。王夫之的關於道不離器、天下惟器的道器觀，是他的史論與易理相通的內在根據。王夫之晚年在完成《周易內傳》後，繼之撰寫了《讀通鑑論》。他的易學成就為他的史學思想提供了哲理基礎；另一方面，夫之的歷史評論，為他的易學思想作出了歷史的解釋。」吳懷祺：〈王夫之的易學與史論〉，頁3。

事易學的重要代表；²¹湯斌〈易學「變通」思維與王船山史論探析〉²²從《易》之變通分析歷史中的通變之道，彰顯《易》的實用價值；陳曦《王船山對《周易》憂患意識的闡釋及其在史論中的體現》²³分別論述《周易內傳》、《讀通鑑論》裡的憂患意識，並進一步將之貫通結合，此文較少有《易》卦爻辭與史論的切應分析。²⁴綜觀今人的研究成果，關注焦點主要擺置於《周易內傳》、《周易外傳》二書的分析，探討船山解《易》注《易》援引史事的情形，而在與船山史論的比較對照部分明顯較少，以船山史論為主軸探討用《易》情形的更為罕見。因此，本文選擇將重心放在兩本史論上，聚焦於船山史論中援引《易》學思想、卦爻辭象的部分，並爬梳溯源與《周易內傳》的注釋作一交叉比對，藉由彼此觀照、彙整來抉發蘊藏其中的經世思想。²⁵由於船山主張理事不離、²⁶即器論道²⁷著重在「事理」的思考，因此他的義理思想可在史論中獲得進一步的印證。是以，筆者希冀藉由以史述《易》的視角檢驗，能對船山的經世思想有更全面開拓的認識，體現船山學說精彩處以及價值意義所在。

二、「位」的權衡：論政統與天下之大貞

²¹ 李皇穎：「觀《周易外傳》一書之著述背景與體制，此書始撰於乙未年（1655），即順治十二年，明永曆九年，時值明清鼎革之際，夫之年三十七，假學《易》以寄其忠愫，故有是書之作也。計此書自撰述至流傳，前後達二百一十年，學術傳承之難，於斯可見。《外傳》以援史證《易》見長，全書援引史事，達四十九卦之夥，殆及〈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亦每每引史證《易》，不勝枚舉。足見《外傳》一書以援史證《易》為最大特色，王夫之為明遺史事易學之重要代表。」李皇穎：《明遺史事易學研究》（高雄：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03年8月），頁158。可參考此書第六章〈王夫之史事易學〉，頁133-158。

²² 湯斌：〈易學「變通」思維與王船山史論探析〉，《船山學刊》2012年第1期（2012年7月），頁19-23。

²³ 陳曦：《王船山對《周易》憂患意識的闡釋及其在史論中的體現》（昆明：雲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2007年。）

²⁴ 至於船山史論研究部分，可參考涂治瑛：《王船山宋論之研究》（高雄：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林書漢：《王夫之《讀通鑑論》、《宋論》理勢觀研究》（臺北：世新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12年）、劉毅鳴：《王船山史論研究——以政治為核心的探索》（桃園市：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年。）

²⁵ 以此三書比較是因三書皆作於船山晚年時期。船山67歲作《周易內傳》，69歲撰《讀通鑑論》，參見清·王之春：〈船山公年譜〉，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6冊，頁366、371。又《宋論》完成於逝世前幾個月（73歲），在思想見解上能相互闡發。見〈宋論編校後記〉，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345。

²⁶ 明·王夫之：《尚書引義》：「勢者事之所因，事者勢之所就，故離事無理，離理無勢。」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2冊，頁335。

²⁷ 明·王夫之：《周易外傳》：「天下惟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謂道之器也。」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027。

船山藉由「位」來分析史事得失，並以「位」闡述政統結構與天下之大貞。除了以當位與否來分析成敗得失外，亦有以卦爻間的相對關係來比喻人事中的互動變化。

（一）以「位」論政統：一體分治與國家之維繫

船山以天子之位代表的是治統與儒者之統代表的道統並列為天下兩大極重者，君位之重要性自是不在話下。²⁸那麼君位與治亂的關係為何？船山以為，當世人認為天子之位已輕，便會前仆後繼不顧生命地去搶奪，如魏晉南北朝的傅亮、謝靈運、范曄等人。²⁹船山引〈繫辭下傳〉分析道：

位不重，姦不戢，天下之禍亂不已，君臣之分義不立，故《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思所以服天下之心而早戢其異志，必有道矣。愛名器，慎選舉，以重百官。賈生曰：「陛尊、廉遠、堂高。」知言也夫！³⁰

此段言簡意賅，以〈繫辭〉之言提出君權不穩固時應採取的對應之道，完整之義見《周易內傳》：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位也，財也，仁也，義也，聖人之立人極不偏廢者也，所以裁能輔相乎天地，而貞天下之動者也。卦中三、四二爻，三為人之正位，於聖人為位；四為出治之道，於聖人為財；仁以守位，義以理財，則人位而爻之德也。

君道止於仁，唯為民父母，而後可為元后，仁所以守位也。仁者，位中所有之德也。義者，取捨而已。非義而取，則上有匿情，雖責民以善而辭不昌，民乃不服。財散民聚，而令下如流水矣。義者，於財而著者也。³¹

〈繫辭〉以位、財、仁、義作為君位鞏固與治理國家，船山以為此四者乃聖人經世的運用。他從三、四二爻開展守位與用財，須以仁義分別治之。仁是愛民之心，必須將人民視作自

²⁸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天下所極重而不可竊者二：天子之位也，是謂治統；聖人之教也，是謂道統。」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479。

²⁹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70-571。

³⁰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70-571。

³¹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579-580。

己的子女。義是取捨有道，對於國庫的經營與人民的稅收，亦是能否獲得人心的關鍵。從此段船山的闡釋可以反推，君位能否鞏固在於人民的支持，而國家的治理也必須仰賴君主的領導，這是治亂的關鍵之一。

船山探討宋初之治時談及培育人才的重要，他說：

育人才以體天成物，而天下以靖。故《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民志於民而安於利，士志於士而安於義，勿抑其長，勿汙其秀，乃以長養善氣，禮樂興，風俗美，三代之所以敦厚弘雅。³²

養育人才可使天下安定，這是在上位者的責任，船山引〈履〉之象解，見《周易內傳》注釋：

善學《易》者，舍其本義而旁觀取象，以議德行，若〈履〉，若〈剝〉，若〈明夷〉之類是已。風，火皆地類，唯澤最處卑下，與天殊絕，各履其位而不相亂。君子之於民，達志通欲，不如是之間隔，唯正名定分，禮法森立，使民知澤之必不可至於天，上剛嚴而下柔說，無有異志，斯久安長治之道也。三代之衰，上日降而下日升，諸侯、大夫、陪臣、處士遞相陵夷，匹夫起覬覦之思，唯志不定而失其所履，雖欲辯之而不能矣。³³

船山提醒同卦互證不可拘泥於本義以一概全，而要能旁觀取象個別詮釋。船山以澤與天各居其位不相亂來比喻君、民之間的關係，維持分際的關鍵在於正名分、立禮法，使民知不可逆上。士、民各安守本分，可使國家得治，三代之所以衰落，就是由於上下分際漸失的緣故。

另見一例，宋太祖時禁止考生自稱考官門生，而改以殿試由皇帝統一考核，船山認為這是與大臣爭士，違反長久以來人之常情。³⁴船山引〈泰〉之初九，指志同道合者應一起成事，若不以其類則事難成。並將大臣、師儒、長吏比喻為人體各個器官須合而用之。

³⁵見《周易內傳》釋〈泰〉之初九：

³² 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39。

³³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36-137。

³⁴ 參見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26-28。

³⁵ 明·王夫之：《宋論》：「夫士之懷知己也，非徒其名利也；言可以伸，志可以成，氣以類而相孚，業以摩而相益。《易》曰：『拔茅茹以其彙。』拔不以其彙，而獨莖之草，不足以葺大廈久矣。大

初九，拔茅茹，以其彙，征吉。

「茹」，茹蘆也。「彙」，根科也。茅與茹蘆，莖皆堅韌，拔之不絕，而根科相綴。
〈泰〉三陽聚於下，蟠固不解，而初九居地位之下，彙之象也。陽方興而尚潛，未有應四之情，乃二、三兩陽方升，拔之而與俱升，不得終於退藏，而必往交。時宜往而又有汲引之者，故吉。³⁶

茅與茹蘆之莖都是非常堅韌，根科相綴一起，象徵類聚彙集，乃潛在的力量。船山從〈泰〉卦各爻反推初九之效，強調的是整體的和合以及同類凝聚的必要性。以此觀宋太祖之例，與臣爭士實摧毀這潛藏蓄備之勁力，士人的集聚對個人對國家皆是好事，因此君主實不當與臣爭士。

（二）以「位」論天下之大貞：內外、進退的思考

《宋論》裡船山揭示天下有三種大貞：

易曰：『天下之動，貞勝者也。』貞勝者，勝以貞也。天下有大貞三：諸夏內而夷狄外也，君子進而小人退也，男位乎外而女位乎內也。各以其類為辨，而相為治，則居正以治彼之不正，而貞勝矣。若其所治者貞，而所以治者非貞也，資於不正，以求物之正；蕭望之之於恭、顯，劉琨之於聰、勒，陳蕃之於宦寺，不勝而禍不旋踵；小勝而大不勝，終以裁及其身，禍延於國。故君子與其不貞而勝也，寧不勝而必固保其貞。³⁷

引文中船山列舉諸多史事告誡，說明貞勝與否實影響著個人禍福與國家治亂興亡，告誡君子當謹慎應對三大貞，居正以治其不正。「貞勝」一詞出自〈繫辭下傳〉，見《周易內傳》注釋：

「貞」，正也，常也；剛柔之定體，健順之至德，所以立本，變而不易其常者也。

臣，心腹也；師儒，耳目也；長吏，臂指也。以心應耳目之聰明，以耳目應臂指之動作，合而為一人之身，而衆用該焉。其互相離者，不仁者也。不仁者痿以死，如之何君臣爭士而靳為已得也！」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28。

³⁶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43。

³⁷ 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182-183。

吉凶之勝，天地之觀，日月之明，人事之動，皆趨時以效其變，而必以其至正而大常者為之本也。「勝」者，道足以任之謂。吉而不靡，凶而不憂，足以勝吉凶而德業不替者，此貞也。³⁸

「貞」是正、常之義，乃大自然天地萬物變化所依持的標準，本身是至正大常，昭示各種可行的道路。因此，人們須遵循此一標準處世。「勝」便是道的充足實踐，人須「因其變而以行乎吉凶之塗，得其貞勝，則無往而不可成功業」。³⁹在變動之中找尋貞勝之法，乃經世致用的不二法門，是以船山說：「所謂貞者，存乎觀與求而已。」⁴⁰

1. 華夷分際之義

《讀通鑑論》中，船山從華夷生長環境的不同推至兩方在氣質、習性、知行上的差異，主張中國人民須嚴防分際，制定人極保生，視此為天下之大防。⁴¹船山用嚴格的地域分界杜絕變夏用夷的可能，此是以「內、外」來區分華夷。對此，《周易內傳》裡亦有闡述，見〈萃〉卦注：

蓋太極之有兩儀也，在天則有陽而必有陰，在地則有剛而必有柔，在人則有君子而必有小人、有中國而必有夷狄，唯凌雜而相干，斯為大咎。乃陰以養陽，柔以保剛，小人以擁戴君子，夷狄以藩衛中國，陰能安於其類聚，而陽自聚於其所當居之正位，交應而不雜，則陰雖盛而不為陽病。⁴²

船山巧妙地以陰陽、剛柔類比，指有君子、華夏便一定會有小人、夷狄的存在，進一步以陽居正位來闡述彼此應守的分際，從此思考貞勝之「居正以治彼之不正」。這裡「治」的作法卻是各安無事，少了些主動克制的意味。史論裡船山並未提出明確的克制方法，又談及夷狄時多是回顧過往華夏之害，使居正以治夷狄的說法少了些說服力。

2. 太后主政之害

³⁸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577-578。

³⁹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579。

⁴⁰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248。

⁴¹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02-503。

⁴²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368。

宋神宗年幼時諸臣欲改革新法，司馬光將希望寄託在太后身上，船山認為此舉違逆了男女之大貞，⁴³即「男外、女內」，他說：

故人謂溫公守貞有道而未通乎變者，非也。溫公之所不足者，正未能貞也。貞之大者，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彝倫也，事之綱紀也。以陰禦陽，以女制男，何殊乎以夷狄令中國，以小人治君子乎？⁴⁴

船山將此嚴重性類比夷狄華夏與小人治君子，他認為即便「雖有庸主，猶賢哲婦」，⁴⁵根本性否定此一可能。質言之，大貞之理是他分判的最高標準，乃「古今之通義不可違也。」

⁴⁶船山注〈小畜〉上九以爻位比喻，見《周易內傳》：

至於上九，陰挾德以高居，則為之君子者，雖欲有所往，而受其制，則必凶矣。母后稱制，雖無失德，而非賢士士大夫有為之日。陳蕃、司馬溫公、蘇子瞻皆不明於此義，終罹於患。《易》之為戒深矣。⁴⁷

陰居高位，必使君子受制而趨凶，因此雖然母后沒有失德，也非士人可為之日。船山史論中雖然對太后干政多是批判，但仍有少數特殊的變例。如謝安請崇德皇后臨朝攝政，船山肯定謝安反經行權合乎道，因此古今之通義的判斷依然會納入整體的情勢狀況考量。⁴⁸船山在《周易內傳》闡釋〈家人〉卦時，也列舉歷史裡國君寵溺愛妃而誤國的情形，此亦可作男女大貞的借鑑。⁴⁹

3. 君子小人之爭

⁴³ 參見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182-185。

⁴⁴ 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185。

⁴⁵ 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107。

⁴⁶ 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185。

⁴⁷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34-135。

⁴⁸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09-510。

⁴⁹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陽之德本和而健於行，初無不貞之憂，所以不貞者，陰雜其間，干陽之位，而反御陽以行，是以陽因失其固有之貞而隨之以邪。豈特二女之嬪虞，太姒之興周，妹喜、妲己、褒姒之亡三代，為興衰之原哉！」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313。

船山從歷史實例探討君子、小人之爭，舉司馬光依從蔡京改革新法的例子，認為小人變革只是表面，不能與之事君，必須保持距離。引〈革〉之上九：「君子豹變」解之，⁵⁰見《周易內傳》對此爻的解釋：

若其在下之小人，則已改面異嚮，而從虎變之大人，不可使復遵故國之典物矣。為君子者於此而不安於已廢，欲有所行則凶，武庚之所以終殄；唯知時而自守其作賓之正，則微子之所以存商也。⁵¹

君子有所企圖變革改變，但不可寄望小人的幫助，隨意信任小人之言會讓自己陷入險地之中，君子應當自守其正，審察情勢，不該輕舉妄動。船山以武庚、微子正反二例示之，明示遵守大貞的重要性。故船山說：「蓋內君子外小人者，用舍之大經也。」⁵²

三、「時」的權衡：論治道的運用

「時」呈現世界的變動流轉，「勢因乎時，理因乎勢」⁵³、「時異而勢異，勢異而理亦異矣」，⁵⁴人要在情勢變化中尋找可依循的理勢，把握常道貞常處變。⁵⁵《易》特重處變，昭示人事時勢的變化，是以船山說：「夫君子於《易》也，取法各有其時，時者，莫能違者也。」⁵⁶因應不同的情勢時取法不同的卦爻。又言：「時者，聖人之所不能違也」，⁵⁷即便是聖人也不能違逆時勢的發展，正說明審度時勢的重要。⁵⁸本節將分五個面向探討，針對「時」的不同階段探討「時」之大用。

⁵⁰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627-628。

⁵¹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402。

⁵²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44。

⁵³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458。

⁵⁴ 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335。

⁵⁵ 明·王夫之：《周易外傳》：「往者一時，來者一時，同往同來者一時，異往異來者一時。時亟變而道皆常，變而不失其常，而後大常貞終古以協於一。」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112。

⁵⁶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375。

⁵⁷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733。

⁵⁸ 船山在「時」的運用上常有不同的指涉義涵，有時指亙古通今的歷史大勢，有時指今日天下之勢的發展走向，有時是對某一局部的情勢判斷，有時又只是某個時機點。該作何義解釋，還須端視時字前後的文意判斷。

（一）因時制法

蕭規曹隨是歷史中著名的例子，船山分析其中緣由，主因是當時客觀情勢不利，曹參又未有周公之德，因此不得不因。⁵⁹船山援引〈益〉之初九曉喻其難，⁶⁰見《周易內傳》對此爻的闡釋：

初九，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

初既受益，〈乾〉道下施而為長子，可以大有為矣。乃陽之下施以惠初，非徒利其生，而實以成其能，非體〈乾〉元之德以承天之祐，則不足以勝其任，故必「元吉」而後无咎。

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其位在下，力固不厚，慮其奮興一時，而不足以繼，故戒而勉之。此亦為占者言之。

61

此爻告誡人們當力量不足時應當量力謹慎，並且體悟〈乾〉元之德來應天而行。无咎的前提在於元吉，元吉即是〈乾〉元之德，指的是天賦予人的仁性和天函育民物之功。⁶²從人的角度而言是要體察此一天道來兌踐人道，並且戰戰兢兢謹慎應對，尤如本則的曹參。

漢代時董仲舒欲行貢士之法，船山認為這是不察古制精義與時勢變化，⁶³引〈繫辭下傳〉道：

《易》曰：「變通者時也。」三代之王者，其能逆知六國強秦以後之朝野，而豫建萬年之制哉？⁶⁴

⁵⁹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91-92。

⁶⁰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易》於〈益〉之初曰：『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元吉而後无咎，利者非其利也。風淫於上而雷迅於下，其吉難矣。」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92。

⁶¹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350。

⁶²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元、亨、利、貞者，〈乾〉固有之德，而功即於此遂者也。『元』，首也；取象於人首，為六陽之會也。天下之有，其始未有也，而從無肇有，興起舒暢之氣，為其初幾。形未成，化未著，神志先舒以啟運，而健莫不勝，形化皆其所昭徹，統羣有而無遺，故又曰『大』也。成性以後，於人而為『仁』；溫和之化，惻排之幾，清剛之體，萬善之始也，以函育民物，而功亦莫俾倖其大矣。」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43-44。

⁶³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123。

⁶⁴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125。

船山強調「變通」是「時」之道。即便是三代的王者也不能預測數百年後的未來事先擬好制度，《周易內傳》解之：「當其時，立其義，人之乘時速應而不滯以效此也者。」⁶⁵此為「變通」內涵。「時」之「義」是當下所當為者，因時順應。易言之，「變通」是一當下不斷與時俱進的功夫。

蘇威仿造《周官》制法遭到船山嚴厲批評。船山引〈繫辭下傳〉：「通其變，使民不倦。」指君子應當師法三代之「道」，而非只是搬移古代制度。⁶⁶見《周易內傳》對此句的闡釋：

《易》之為位為爻，〈乾〉〈坤〉之變通而已。窮極則陰陽互易以相變；變不可久居，則又順而通之，使陰陽各利其用。變通合，而出入於萬變者皆貞其道，乃可萬世而無敝，此三聖之創制立法所以利百姓之用而上承天祐也。⁶⁷

前二句呼應船山以〈乾〉〈坤〉作為六十四卦基礎的主張，人要在陰陽變化中找尋變通之道。先聖創制立法，無非也是依循順天、因時定制的原則。是以雖然古今勢異，但今人仍可以學習三代制法的智慧，使國家安定得治，此為「通其變，使民不倦」之深意。

經由上述梳理可知，「因時制法」絕非易行之事，其中還包含著諸多面向的綜合考量。大抵來說，因時必須同時兼具「鑑」與「通」的能力，才能在多變詭譎世局中不斷應對調整。

（二）藏器待時

由於世道不一定隨時皆可因通，故有待時之法。見船山論劉瑾、魏忠賢之誅，他說：

嗚呼！劉瑾之誅也，非張永不能；魏忠賢之誅也，發其惡者一國子生而已。豈盡其威劫之乎？懸利以熏士大夫之心，而如霜原之艸，藉藉佗佗而無生氣，國不亡也何恃哉！《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動。」故乘高墉以射隼，而無不獲。⁶⁸

船山認為誅殺逆臣必須等待時機，並且自身要有「器」的依持，他引〈繫辭〉語，見《周易內傳》解：

⁶⁵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577。

⁶⁶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705-706。

⁶⁷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582。

⁶⁸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312。

「器」者，君子乘權以治小人之道也。……所待在時，而必先有動而不括之道，乃可以時至而必動。君子解悖之道，不與爭以求勝；時至道行，則廓然白其志於天下，小人自孚。迫於解者，唯道之不足，東漢黨人所以愈解而愈紛也。⁶⁹

「器」是君子對付小人的利器，乃「動而不括之道」。此道意味著士人能屈能伸、通行暢順不受艱難阻礙，因應時勢變化謀定而後動。「待時」可謂是一種沉著潛藏的功夫，君子若能把握「器」與「時」二者便可撥亂反正治理小人，如劉瑾、魏忠賢之誅。

那麼，當勢已極重不可返時又該如何？宋徽宗時宋朝已步入無可挽回必亡之勢。這時李綱擬定內禪之策，雖然不失為消除閉塞的方法，然而船山認為李綱、种師道皆非是可以力挽狂瀾之人。⁷⁰他說：

勢極於不可止，必大反而後能有所定。故《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否之已極，消之不得也，傾之而後喜。惜其傾而欲善保其終，則否不傾而已自傾。⁷¹

這裡引〈否〉之上九，見《周易內傳》注釋：

上九遠處事外，與陰絕無干涉，而九五立本已固，需時已審，則上九可行其攻擊之威。三陰否隔，已肆行而無餘力，六三之羞，人知賤惡，乘高而下，傾之易矣。否者傾而人心悅矣。⁷²

從上九與其它爻的關係來看，傾倒已是必然的定局，人該做的是在傾倒後找尋重生的契機。李綱等人強行挽救不可挽之勢，非但無法阻止頹勢反而是自己先倒了下來。此爻說明當閉塞至一定程度時便會開始谷底反彈，誠然，歷史上的忠臣往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不可能眼睜睜看國家覆亡，依然會義無反顧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三）防微杜漸

船山於《宋論》中論秦檜，指其從發跡崛起到掌控大權並非一開始就有控制朝廷的念

⁶⁹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594。

⁷⁰ 參見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201-203。

⁷¹ 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201。

⁷²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52-153。

頭，這是在政局與時勢的變化中逐漸形成。宋朝國勢的衰落，讓他能趁勢掌控大局。⁷³船山援引〈坤〉之初六象闡釋：

勢之所激，鼠將變虎，亦奚待操心已入而後成乎大惡哉！故《易》曰：「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馴致者，初非所至而漸以成乎至也。⁷⁴

見《周易內傳》對此爻的注：

凝，聚也。霜、冰皆陰之凝聚而成，在初為始爾。堅冰之至，初無異理，即此陰之凝者然也。「其道」，凝而不釋之道。「履霜」，象辭所謂「先迷」；「馴致」，則所謂「得朋」也。⁷⁵

堅冰形成之初，一開始陰氣的凝聚並沒有異常，「馴致」就是「得朋」，即「積陰相怙」，⁷⁶乃陰氣的凝聚。「履霜」是「先迷失道」之象，倘若君子能事先洞悉，就能順道而行，⁷⁷此就是防微杜漸之識。船山提出士人必須識大量遠，⁷⁸又：「夫人大小之分而高下殊焉，存乎其量而已矣。」⁷⁹識量不高者見識淺陋、不易成事，⁸⁰可於此則史例印證，見船山道：

夫霜非冰也，而陰森慘冽之氣，一夕流空，則愴然悚栗之情，自感人之志氣，欲辨之，亦何難辨之有乎？不可辨者，志也；所可辨者，人也。志，無定者也。志於正者，勢溢而志或以淫；志於邪者，力窮而志因以詘。人，有定者也。賢者之志雖已移，而必有所憚不敢為；姦人之志雖未萌，而必有所恃以操其利。故察之於始，檜非有操、懿之心，勿容苛論也。考之於其所行，不難為石敬瑭、劉豫之為者，豈有

⁷³ 參見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249-250。

⁷⁴ 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250。

⁷⁵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78-79。

⁷⁶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75。

⁷⁷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六陰聚立，有『先迷』之象。然純而不雜，虛靜以聽天之施，則固先陽後己、順事物而得唱和生成之常道。君子體之以行，能知先之為失道，而後之為得主，則順道而行，無不利矣。」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77。

⁷⁸ 明·王夫之：《四書訓義（上）》，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7冊，頁370。

⁷⁹ 明·王夫之：《四書訓義（下）》，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8冊，頁839。

⁸⁰ 明·王夫之：《俟解》：「識量小者恆驕，夜郎王問漢孰與我大，亦何不可驕之有！」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2冊，頁480-481。

察之而不易知者乎？⁸¹

當還在「霜」的階段時人們就可先觀察，然而因為「志」未有固定所以無法辨析。此階段尚有察覺的可能，雖然姦人之志尚未萌發，但能從秦檜的行為中端見跡象。能否洞悉取決於識的高低，胡安國被秦檜所欺瞞，⁸²就是識之不足無法明察。〈坤〉之初六體現的是一隱伏潛藏的危機，透過〈坤〉卦分析可見其端倪，然而若是無洞察之識便無法阻止奸邪竄起。可再觀王莽之例，船山說：

《易》曰：「伏戎于莽，三歲不興。」不興者，慮其興之辭也。三歲而不興，逮其興而燎原之燄發於俄頃矣。哀帝崩，元后一聞之，即日駕之未央宮，馳召王莽，詔諸發兵符節、百官奏事、中黃門、期門兵皆屬莽。……元后偃息談笑而坐收之。故莽有伏戎，藏於平蕪蔓艸之中，無有險阻之形而不可測也。三歲伏而一旦興，有國者可不戒哉！⁸³

漢哀帝駕崩後，元后將兵權、奏事全部移交給王莽，導致王莽篡位西漢滅亡。船山認為哀帝即位時王莽曾隱居於野，沉潛養足實力，一旦機會到來便如燎原之火讓人猝不及防，因此並非僅是元后將大權轉交的緣故。這裡引〈同人〉九三，告誡「伏戎于莽」潛在的危機甚大，同時也不易察覺。此爻注中恰好是相反的對照例子。注中敘述漢光武帝識破阮囂想要聯合竇融抗漢的念頭，先一步拉攏竇融化解計策。⁸⁴藉由正反二例反映出船山《易》史互證的靈活性。

再觀李泌之例，船山認為李泌在動亂發生前就提早治理杜絕，保護國家免受危害，足堪作大臣的表率，引〈否〉之九五與上九兩爻合釋。⁸⁵見《周易內傳》：

九五，休否，大人吉。其亡其亡，繫於苞桑。

「休」，安處也。木叢生曰「苞」。桑根入土深固，叢生則愈固矣。九五陽剛中正，

⁸¹ 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250。

⁸² 明·王夫之：《宋論》：「胡康侯之為檜欺也，據目前之志，忘馴致之變，宜其惑已。」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252。

⁸³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200。

⁸⁴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竇融之在河西，既歸心漢室，而阮囂中梗，欲連合以拒漢，光武洞昭其姦，明以詔融，河西之人謂天子明見萬里，卒歸漢，而囂計遂窮，蓋類於此。」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59。

⁸⁵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863-864。

道隆位定，安處不撓，而又得四、上二陽以夾輔之，故時雖否而安處自如，大人靜鎮以消世運之險阻，吉道也。……大人雖否，而亦何不吉之有！

上九，傾否，先否後喜。

上九遠處事外，與陰絕無干涉，而九五位本已固，需時已審，則上九可行其攻擊之威。⁸⁶

「苞」象徵一國的根本，即人民百姓與國家領土，若能治理得宜則國勢愈穩，愈根深蒂固，雖處不利之時亦能化消險阻。「其亡其亡」象徵不利情勢與潛藏危機，這時必須要守正明慎方可免禍，如文中的周公、朱子。〈否〉之上九是由塞轉通的關鍵，船山認為正是由於九五爻已經穩固，在此基礎下才有轉變的契機。質言之，先立本，方能有本錢逢凶化吉，這是對個人自我的要求。船山論隋唐時的高麗國也引用〈否〉之九五，指高麗國上下因能知懼做好準備，故能抵禦隋唐兩代的入侵。⁸⁷船山所主張的謀《易》使人有憂患意識，可於此例明證。

（四）審時用密

唐太宗為立太子一事找長孫無忌商量，船山認為所問非人，長孫無忌內藏私情，太宗之志暴露，導致後來吳王恪被殺，船山引〈繫辭上傳〉「君不密則失臣」一句定之。⁸⁸見《周易內傳》解：

君不密則失臣。

「密」者疏之反，非詭密之謂；詳審其時，細察其人，謹防其患，不敢疏也。「失臣」，嫉忌者乘而傷之。⁸⁹

「密」並不是狡詐密謀的意思，而是要防患於未然，詳審時勢與臣子作為。君主將心中意欲告知不對的人，就會引起波瀾，讓臣子洞悉而有操作空間，甚至失去彼此的信賴。〈繫辭〉中船山進一步概括「言」之大用，乃「通」之關鍵。⁹⁰

⁸⁶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52。

⁸⁷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720-721。

⁸⁸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787-788。

⁸⁹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542。

⁹⁰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故聖人教人，屢以慎言為戒，而行則唯勸之以敏。知塞者，不塞之於行，而塞之於言，則知塞而知通矣，不憂天下之不孚矣，何失身害成之憂哉！此尤擬議切近之實功也。」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542-543。

同理，臣子於「密」不慎也會釀禍，以韋執誼為例。船山批判韋執誼難成大事，本可共圖之事，卻選擇密謀使自己居於險地，又志得意滿不知危險，最後一敗塗地，是不能寄託大事者。⁹¹引用〈節〉之初九：「不出戶庭，无咎」論之，見《周易內傳》解：

戶，室戶；庭，其外楹間也。時方在室內而未行，道宜鎮密。陽剛下實，防陰之流，慎之於內而不使出，涵其有餘以待不足，雖過於慎，而自无咎。⁹²

這時在室內還未行動，應小心謹慎，雖然可能太過小心翼翼，但並不會帶來傷害。韋執誼就是不明此道導致革新失敗。

（五）審情治民

在上位者治國時必須留意民情的變化，如用刑。船山認為拓拔弘特別重視被判重刑的人，多令重審來表示他的寬恕憐憫。船山以為這樣眾多囚犯群積於牢獄中並不是件好事，引〈旅〉卦之象闡釋。⁹³見《周易內傳》解：

既明且慎，則速斷之。而不淹滯以滋擾，如山上之火，過而不居。君子之於民，教之治之，皆遲久而不迫，唯用刑則非君子之本心，不得已而寄焉耳。留之則證佐待理而久淹，枝葉旁生而蔓引，胥吏售姦而迭為舞易，其殃民也大，而姦人得以規避，故以「不留」為貴。⁹⁴

從〈旅〉之卦象所示，用刑是君子不得已而為之，是以應當果斷審判速理速決。否則將犯人留在獄中越久，變數越大，難以預料胥吏是否會與之串通一氣來矯行詭詐，如此禍延百姓衍生弊害甚大，故「不留獄」才是上策。船山辨析甚為清楚，此是從人之常情考量，預早防範。

若能把握民情，那麼便可進一步提出應對治理的方法。以宋初為例，船山指出當時的政治弊端在於導民言利與聚財等問題上，使百姓因制約束縛而相互爭奪，趨利失道。⁹⁵船山引用〈文言〉：「〈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提出治理人情的方法，見《周

⁹¹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944-946。

⁹²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475。

⁹³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96。

⁹⁴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448。

⁹⁵ 參見明·王夫之：《宋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1冊，頁94-96。

易內傳》對此解：

〈乾〉之始萬物者，各以其應得之正，動靜生殺，咸惻隱初興、達情通志之一幾所
函之條理，隨物而益之，使物各安其本然之性情以自利；非待既始之餘，求通求利，
而唯恐不正，以有所擇而後利。此其所以為大也。⁹⁶

〈乾〉卦之效在於能以利之正通達天下，「利者，健行不容已之情，即以達萬物之情」，⁹⁷故就算不言利也無所不利。倘若初始時偏向其中一端，那麼就是出自於私利無法兼顧各個地方，而〈乾〉之元乃「統萬化而資以始」，⁹⁸能使萬物各安其本性，從這延伸到治國上，便是讓百姓各適其情、達情通志相安無事。船山藉由〈乾〉卦說明治理百姓的道理，著眼的亦是民情，「所以變化咸宜而各正性命，物之性情無非〈乾〉之性情也。」⁹⁹將物之性情與〈乾〉卦昭示聯繫起來，揭示〈乾〉卦指涉的關鍵在於人情的調度，此即是「絜矩之道」¹⁰⁰的功夫。從〈乾〉之初始與統御大用，可略得〈乾〉卦作為六十四卦之本的理由。

四、「貞」與士道：論出處進退與生死際遇

船山以「儒者之統」作為士人依循的規範準則與精神象徵，其重要性堪與帝王之統並立。¹⁰¹儒者之統儼然就是士道的代名詞，為士人須努力實踐的畢生目標。船山評張載：「貞生死以盡人道，乃張子之絕學」，¹⁰²此「貞生死以盡人道」亦是船山史論裡討論的一大重點。士人最常遇到難題就是出處進退與生死抉擇。「君子以出處為生死」，¹⁰³本節將從史

⁹⁶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9。

⁹⁷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8。

⁹⁸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8。

⁹⁹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9。

¹⁰⁰ 明·王夫之：《四書訓義（上）》：「物之不齊而各有所應得者，猶之矩也；君子察乎理而審乎情，以各與所應得者，此心之絜度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而國可治，天下亦可平矣。」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7冊，頁88。

¹⁰¹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儒者之統，與帝王之統並行於天下，而互為興替。其合也，天下以道而治，道以天子而明；及其衰，而帝王之統絕，儒者猶保其道以孤行而無所待，以人存道，而道可不亡。」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68。

¹⁰² 明·王夫之：《張子正蒙注》，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2冊，頁21。

¹⁰³ 明·王夫之：《周易外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868。

論中考察船山如何運用《易》道面對此一課題。

（一）量己與進退之道

馬援大半生涯征戰沙場居功厥偉，但到晚年時無法自安己命，勉強爭勝的結果便是晚節不保。¹⁰⁴船山引〈離〉之九三道：

《易》之為教，立本矣，抑必趣時。趣之為義精矣，有進而趣時，未往而先倦，非趣也；有退而趣時，已過而猶勞，非趣也。「日晷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援之未與！¹⁰⁵

《易》教人立本趣時，從時機的判斷決定進退，過猶不及皆非因時，如馬援之例。此爻同樣引論於王敦、桓溫，二人就算快死了還在謀劃篡位，船山批評他們居高位卻不滿足，是將自己與宗親置於險地。¹⁰⁶船山引述此爻的評論甚是犀利，¹⁰⁷觀《周易內傳》對此爻的闡釋：

九三以剛居剛，而為進爻，前明垂盡，不能安命自逸，而懷忿戾以與繼起爭勝，不克則嗟，所謂日暮途窮，倒行逆施者也。生死者屈伸也，樂以忘憂，唯知此也。衛武公耄而好學，非自勞也，有一日之生則盡一日之道，善吾生者善吾死也，樂在其中矣。「大耋之嗟」，豈以憂道哉！富貴利達，名譽妻子之不忍忘而已。馬援跼足於武溪，卒以召光武之疑怒而致凶，況其下焉者乎！¹⁰⁸

王敦、桓溫、馬援三人皆是已到黃昏暮年，應要「安命」量己審勢。「大耋之嗟」隱喻人至衰老時力不從心，因此必須「修身以俟命，慎動以永命」。¹⁰⁹船山注此爻〈象〉：「知不可久，則鼓缶而歌可矣。少而不勤，老而不逸，謂之下愚。」¹¹⁰值此之時應當「鼓缶而

¹⁰⁴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247。

¹⁰⁵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247。

¹⁰⁶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08-509。

¹⁰⁷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易》曰：『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大耋矣，何嗟乎？名之未得、利之未遂焉，俄而嗟矣；俄而並忘其嗟，而埋未冷之心，引將絕之吭，以思戈獲矣。有涯之日月，廢鼓缶之歡，營營汲汲，笑罵集於厥躬而不恤。」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08。

¹⁰⁸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271。

¹⁰⁹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935。

¹¹⁰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271。

歌」，象徵一種超脫不拘於俗的豁達心情。此爻頗能呈現人生感悟，點出土人晚年常有的困境。

（二）守道與占學一理

船山說：

高允幾於知《易》矣。《易》曰：「其出入以度外內，使知懼。」故聖人之作《易》也，使人度也，使人懼也；使人占也，即使人學也。子曰：「不占而已矣。」謂不學也。拓拔丕從劉絜而欲謀篡，夢登白臺，四顧不見人，使董道秀筮之，而道秀曰：「吉。」此以占為吉，而不知以學為占也。允曰：「亢龍有悔，高而無民，不可以不戒。」此以學為占，而不於得失之外言吉凶也。¹¹¹

這裡分辨「以占為吉」與「以學為占」的不同，是要人們切勿本末倒置，不能只為求得吉利而占卜，須繫於現實的得失以論吉凶。這表現出船山「占學一理」、「得失吉凶一道」的特點，將卜筮與義理結合起來，強化占卜的合理性與務實性。船山以為聖人作《易》的目的在使人審度情勢、知懼存憂患意識，「其出入以度外內」引自〈繫辭下傳〉，見《周易內傳》解：

此言其不可遠也。「外內」有定位者也；剛柔之往來，無定位者也。以无定之出入，審度所以行乎其位者，則精義不可以執一求，而抑不可以毫釐差。言《易》雖屢遷，而當幾之得失，於一出一入，揆度外內，使人知道之不易合者。又明於憂患之必有，與所以致之之故。¹¹²

《易》有定「位」，外、內有跡可循，然而剛柔的往來是沒有定位的，因此不可執一以定，而是要明審目前的情勢。是以，人們需要時時警惕、戒慎恐懼，仔細審度內外，體察勢幾的變化，把握人所當為之事。船山出仕南明時曾遭遇過重大難題，便是用《易》占筮思量，最後避開殺身之禍。¹¹³他雖占《易》卻非全然靠《易》，而此則的拓拔丕迷信卜占，過於

¹¹¹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71。

¹¹²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06。

¹¹³ 清·王啟：「數載後，可望遣李定國入粵，遂入衡。中舍管公將託之以身殉故主，約亡考偕行。亡考筮之，兩得〈睽〉之〈歸妹〉，因念定國之睽孤終凶，而可望之虛筐无攸利也，作〈章靈賦〉以見志。……遂深避於嶽之蓮花峰。孫、李互乖，扈主諸臣卒盡罹咒水之難。管公不知所終，亡考嘗

深信占筮出來的結果，致使自己陷入險地。「故占者，學者不可執一凝滯之法」，¹¹⁴在「占學一理」的思維下，「占」與「學」不能輕易分割，不可流於外在形式缺乏《易》道內涵。

船山甚是推崇三國時代的管寧，以為他能在亂世中秉道自守，是真正具備龍德者，非是其他三國豪傑可以媲美。¹¹⁵「龍德皆聖人之德」，¹¹⁶文中管寧言「潛龍以不見成德」出自〈乾〉之初九「潛龍勿用」，見《周易內傳》的闡釋：

「勿」，者戒止之辭。「勿用」，為占者言也。龍之為道，潛則固不用矣，無待止也。占者因其時，循其道，當體潛為德而勿用焉。才德具足於體而效諸事之謂用。既已為龍，才盛德成，無不可用，而用必待時以養其德。其於學也，則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其於教也，則中道而立，引而不發；其於治也，則恭默思道，反身修德；其於出處也，則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其於事功也，則遵養時晦，行法俟命；其於志行也，則崇樸尚質，寧儉勿奢，《易》冒天下之道，唯占者因事而利用之，則即占即學。卦有小大，若此類卦之大者，皆可推而通之。¹¹⁷

船山認為時機未到時應潛藏不發，既已為龍德便有應對天下事的能力，如學、教、出處、治、事功、志行等等皆能得宜，筆者以為這是因其能「通」天下之道的緣故，即《讀通鑑論·敘論》所說的「君道在焉，國是在焉，民情在焉……」管寧便是能達到這般高度的人。筆者以為船山所言經世並非僅限於廟堂之上，隱於市林秉道自守亦是一種經世的實踐方式。¹¹⁸船山對管寧的高度評價以及對儒者之統的重視，¹¹⁹在在反映出另一種形式的經世實踐。

（三）貞生死以盡人道

歷史記載蔡邕因為害怕董卓的威脅而投靠他，船山反駁，認為真正原因是蔡邕寄望董

南望而悲憶之。」〈大行府君行述〉，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6冊，頁72。

¹¹⁴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06。

¹¹⁵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346。

¹¹⁶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2。

¹¹⁷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45-46。

¹¹⁸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故寧之仁，終不能善魏之俗。君也，薦紳也，父老也，君子之無可如何者也。吾盡吾仁焉，而道窮於時，不窮於己，亦奚忍為焦先、孫登、朱桃椎之孤傲哉？」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404。

¹¹⁹ 如肯定河西之儒於亂世傳道之功，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68-569。

卓能除掉宦官，然而投靠董卓只不過是從一個亂源轉移到另一個亂源。¹²⁰ 船山引〈豫〉之六二說明：

《易》曰：「介于石，不終日。」介於石，貞之至也；不終日，見幾而無執一之從違，乃以保其貞也。邕勿論矣。欲養浩然之氣，日新其義而研之以幾，其尚以邕為戒乎！¹²¹

此揭示貞之道的重要性，見《周易內傳》闡釋：

介于石，中立而不倚於物，則至正而萬變不出其樞機，善惡之幾不待審而自著，可以不待終日而應之速。故九四之奮興以快所為，其本在此大正而無不吉也。¹²²

此處點出「道」與守正的重要，倘若蔡邕能執正處變，那麼宦官、董卓等人自然就無法傷害到他。船山彰顯持道守正之效，順應當行之路就有趨吉避凶、化險為夷的可能，反之，若離經叛道難保己身，例如李斯，不守正的下場便是遭來殺身之禍。¹²³

是以，對於守「道」歷史中屢有明鑑。如李密，首鼠兩端，做事投機沒有個定性，因而不受信任，最終眾叛親離下場淒慘，此為「不恆」之危害，船山引〈恆〉之九三說明。¹²⁴見《周易內傳》闡釋：

九三，不恆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卦唯三與上為當位，而其占「凶」「吝」者，恆者變而能常者也，三與上恃其位之正，見一時之可安而不久以其道，則不能恆必矣。¹²⁵

能堅守恆長之道者便能在時勢變化中立身自處，然而那些一時安逸就改變作為的人很可能遭受到不可預期的恥辱，這裡點出不恆的後果。此爻注釋以同卦互證，分析各種不同時的情形。

¹²⁰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335-337。

¹²¹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337。

¹²²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178。

¹²³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71。

¹²⁴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736。

¹²⁵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287。

船山認為，當士人面臨生死之際時，會有「死之道」與「死之機」的選擇，這便是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的差別。¹²⁶舉例來說，韓偓能堅守正道，因此屢屢逢凶化吉，¹²⁷郭子儀置身死於度外，冒險親赴回紇之約，最後威震對方全身而退。¹²⁸此是守道處世貞而吉的體現。又如孫鶴勸阻劉守光稱帝被殺，¹²⁹子路保護主上而死，¹³⁰兩人行徑卻受到船山的批評，以為孫鶴反助長對方稱帝信念，子路為亂人而死，乃不貞而凶，非守道者。誠然，歷史中多的是貞而凶、守道而死的例子，如張嵯死於侯景，¹³¹蕭懿盡忠被東昏侯賜死。¹³²船山對於兩人評價甚高，從此再深思「貞生死以盡人道」，可知船山固然強調貞與吉凶的因果關係，但更重要的還是超越生死之外士道價值的實踐。

五、結論：融貫《易》史以經世

船山認為讀史的目的在於經世致用、通變資治，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鑑往知來，帶有強烈實用意識，這與他即事論理、即器論道的哲學思維是密不可分的。因此，其注《易》與論史常出現《易》史互證的論述方式，如引史事說明卦爻象，或引《易》評斷歷史人事中的得失成敗，便是透過史事切應聖賢義理強化他的立說與清晰步驟脈絡。相較於《周易內傳》引史論《易》，史論引《易》論史呈現出不同的詮釋風貌。透過詳述事件始末，能更細部的觀察《易》史互證，將《易》之變化與情勢考量做更具體的比附討論。經史結合以經世，反映的是經常與權變彼此融會貫通後的靈活應用，「通變」之道便是藉由《易》史互證闡釋出其價值所在。職是，經由本文的分析可以發掘船山《易》史互證有幾項詮釋特色：第一，透過史事的補充，延伸《易》象、卦爻辭的闡釋，使其義理更為清晰明確，並深化「時」與「位」結構和對應的意義；第二，同一爻的運用有正反兩面的舉例，藉由得失成敗的對照，延展此爻的討論空間；第三，部分互證雖以一卦或一爻為主，然其解釋會援引其它爻來佐證，開拓此爻之詮釋空間，注重發展過程中的關鍵影響；第四，船山大

¹²⁶ 明·王夫之：《讀通鑑論》：「人臣當危亡之日，介生死之交，有死之道焉，有死之機焉。蹈死之道而死者，正也；蹈死之道而或不死者，時之不偶也；蹈死之機而死者，下愚而已矣。」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1067。

¹²⁷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1067-1069。

¹²⁸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886。

¹²⁹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1087-1088。

¹³⁰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535-536。

¹³¹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661-662。

¹³² 參見明·王夫之：《讀通鑑論》，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0冊，頁620-621。

抵把握《易》之不易、簡易、變易的特性，論述能明確彰顯出此些特點；第五，大量引用〈繫辭傳〉論史。船山認為「《易》之精蘊，非〈繫傳〉不闡」，¹³³〈繫辭傳〉呈現的是《易》之大義原則，船山常以此來評定得失，意味著此為人所須遵守的基本行事準則。¹³⁴此外，〈乾〉卦的重要性與影響力也在史論中彰顯出來，代表人的主動改變性，而〈坤〉卦多是昭示外在情勢環境的變化應對，合視〈乾〉〈坤〉二卦正是《易》立本趨時的體現。¹³⁵筆者以為這也側面反映出〈乾〉〈坤〉作為六十四卦基礎的價值意義。

船山《易》史互證中所體現的經世思想，亦可歸納出下列幾個要點：第一，船山基於即事論理、因時（勢）制宜的特點，很重視人事外在情勢的變化，因而他的「道」之實踐往往須根據現實情況而有所改變作彈性調整，關鍵在於把握「道因時而萬殊」；第二，船山強調士道持守，他深信透過士道的堅持與把握，人有趨吉避凶、扭轉不利情勢的可能，這是他對人之主動性與發展性的一種寄託期望，而個人的識量能力也成為考驗的主要標準。船山深思人事中同步發展的複雜現象，這種多線立體相互的辯證方式，與其注重整體性的思維有關。並藉由理勢細部分析史事始末，獲得更高深的處世智慧；第三，從《易》「位」分析國家體系的結構維繫。船山甚是看重大貞，將之作為最高的考量原則，列舉過去歷史中違反大貞的慘痛教訓，不斷強調「居正以治彼之不正」的重要；第四，以「時」論治道，談因時制法、藏器待時、防微杜漸等等，透過《易》卦爻辭彰顯天道人事微妙的互動變化，從時勢的走向發展推演應對之法，這是船山《易》史互證最有特色價值的地方。

總的來說，經世是從內聖到外王的貫通實踐，同時考驗著個人修養與應對外在情勢變化的能力，二者聯繫著個人的得失成敗、歷史的治亂存亡。經由《易》、史互證開展出歷史的經驗教訓，使《易》落實於人事中實踐，展現《易》道應用的一面。古代士人面對的往往是理想與現實間的落差衝突，因此有經權、常變的彈性調整，《易》之通變也正是在兩間遊走中尋找一折衷之法。船山對士道的要求是很高的，然另一方面又得面對清初遺民的窘困心境，在痛苦與磨難中繼續堅持著貞勝理想。誠然，在中國歷史上多見的是不貞勝之例，人類如何記取經驗教訓，如何應對每一時代的課題挑戰，都讓經典的智慧與存在的價值意義不斷延續下去。

¹³³ 明·王夫之：《周易內傳》，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683。

¹³⁴ 根據筆者統計，船山史論引用〈繫辭傳〉便至少十數次，直接化用的地方更多，舉如「變通者時也」、「天下之動，貞勝者也」、「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等等。這些出自〈繫辭傳〉的思想實際上也是船山論政和士人處世的重要原則。因此史論的頻繁引用可謂闡揚了《易》之精蘊，在史事中獲得了進一步的印證和反思。

¹³⁵ 《周易內傳》中也有類似的論述，明·王夫之：《周易內傳》：「〈乾〉以剛修己，〈坤〉以柔治人。君子之配天地，道一，而用其志氣者殊也。修己治人，道之大綱盡於〈乾〉〈坤〉矣。」收入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編校：《船山全書》第1冊，頁55。

徵引文獻

古籍

明·王夫之 WANG, FU-ZHI, 船山全書編輯委員會 Editorial board of the Chuanshan Quan shu 編校：
《船山全書》Complete Works of Chuanshan(長沙 Changsha:嶽麓書社 Yuelu Publishing House ,
1996 年)，第 1 冊、第 2 冊、第 7 冊、第 8 冊、第 10 冊、第 11 冊、第 12 冊、第 16 冊。

近人論著

何佑森 HE, YOU-SEN：《清代學術思潮——何佑森先生論文集【下冊】》Waves of Qing Scholastic
Thought - Collected Essays of He You-sen [Vol. 2](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2009 年 4 月)。DOI: <http://dx.doi.org/10.6327/NTUPRS-9789860179224>

李皇穎 LI, HUANG-YING：《明遺史事易學研究》“Studying the Book of Changes Through Historical
Events” by “Leftover” Ming Scholars (高雄 Kaohsiung: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h.D. Thesis, 2003 年 8
月)。

汪學群 WANG, XUE-QUN：《王夫之易學——以清初學術為視角》Wang Fuzhi's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Scholarship of the Early Qing as a Perspective (北京 Beijing: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2002 年 5 月)。

林書漢 LIN, SHU-HAN：《王夫之《讀通鑑論》、《宋論》理勢觀研究》The Study on Wang Fu Zhi's
Interpretation on “Li” and “shi” in his Du Tongjian Lun and Song Lun (臺北 Taipei:世新大學中
國文學所碩士論文 Shih Hsin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 2012
年)。

吳懷祺 WU, HUI-QI:〈王夫之的易學與史論〉“Wang Fu Zhi's Study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his
Historical Treatises”，《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第 24 卷第 6 期（2000 年 11 月），頁 1-7。

涂治瑛 TU, JIH-YING：《王船山宋論之研究》Wang Chuan Shan Song Lun Jih Yan Jiou (高雄
Kaohsiung: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碩士論文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Master Thesis, 2002 年)。

陳曦 CHEN, XI：《王船山對《周易》憂患意識的闡釋及其在史論中的體現》Wang Fu Zhi's Concerns

Realized From Reading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Their Reflection in his Historical Treatises（昆明 Kunming：雲南師範大學中國古代史碩士論文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Ancient Chinese History Program Master Thesis，2007 年）。

黃忠天 HUANG, CHUNG-TIEN：〈史事宗易學研究方法析論〉“An analysis on the method of Yi studies of the history sect”，《周易研究》*Studies of Zhouyi* 2007 年第 5 期（2007 年 10 月），頁 39-52。

湯斌 TANG, BIN：〈易學「變通」思維與王船山史論探析〉“The Idea of ‘Obtaining Free Course’ in Studies of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Wang Chuanshan’s Historical Treatises”，《船山學刊》*Chuanshan Journal* 2012 年第 1 期（2012 年 7 月），頁 19-23。

劉毅鳴 LIOU, YI-MING：《王船山史論研究——以政治為核心的探索》*A Study on Wang Chuan Shan's Historical Review Focus on Politics*（桃園市 Taoyuan City：國立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Ph.D. Thesis，2012 年）。

Wang Fuzhi's Statecraft Ideology Present in his Comparisons Between History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LIN, SHU-HAN

(Received March 30, 2020 ; Accepted June 30, 2020)

Abstract

As a scholar versed in the histories and classics, immersed in state affairs during the Ming-Qing transition, Wang Fuzhi's simultaneous exegeses on history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reflected his awareness of the hardships his country and countrymen faced as well as his thoughts on statecraft. This also reflected his belief in using scholarship to directly deal with the changing tides of current events. Wang Fuzhi believed that the essentials for studying statecraft could be learned from history. His thoughts on statecraft were based on the belief that studying history should have practical use for managing the state, this is visible most clearly in his discussions of history. This paper will explore how Wang Fuzhi managed to combine together his studies of both history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This paper will start by analyzing the ideas of "position" and "timeliness", "position" to speak of the virtue of the kingdom and its government, "timeliness" to speak of proper governance. Then we will analyzing Wang Fuzhi's high expectations for scholars, using the term "virtue" to speak of practicing the way of the scholar, analyzing the scholar's choice to advance or retreat, and looking 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uck and keeping the scholar's way. Using this methodology of comparing history and the *Book of Changes*, Wang Fuzhi was able to more clearly understand the causes of the

innumerable changes throughout history, to add depth to his thinking on statecraft, and to embody his core values in his thought.

Keywords: *Wang Fuzhi, Chuangshan, Statecraft, Mutual Reflection between the Book of Changes and History, Zhensheng.*